

何世达 主编

上

现代汉语

中国逻辑与语言
函授大学教材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教材

现代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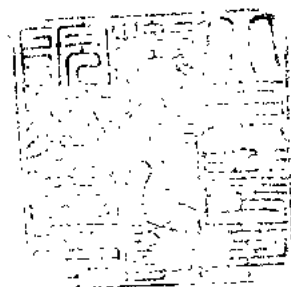
增订本

(上册)

何世达 主编

吴为章 苏培成 郭明玖 何世达
柴世森 季泽昆 黄汉生 张炼强

编写



北京大学出版社

2R85/04

现 代 汉 语

(上、下册)

何 世 达 主 编

责 任 编 辑: 胡 双 宝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河北张家口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394千字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40,000册

统一书号: 9209·56 定价: 2.90元

序

徐 仲 华

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的教材《现代汉语》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值得在这里说一说。

一则是讲求实用，不树山头。只要你翻开这本书，不管是词汇，是语法，还是修辞部分，就不难发现：这里面找不到深文奥义，更没有什么对各家体系的抨击，对自家体系的宣扬——其实，本书根本就谈不上自创的体系，有的则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平实之论，无非是介绍一些语言现象，并给以科学的说明，想借此提高读者学习语言的兴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如此而已。

本书的讲求实用还表现在例句的丰富上，既有正面的例子，又有误用的例子。在讲病句及其修改时，首先注意到把大家公认的和是不是病句还有争议的区别开来。“对于一时难以判断正误的句子则应该慎重对待，要给它们以接受语言实践考验的机会。”

本书的讲求实用还表现在各部分篇幅的分配比例上。即以修辞部分而论，修辞格只作最基本的介绍，而词语的运用和句式的选择等则多方解说。这种分配比例在一些修辞著作中也是仅见的。

本书的讲求实用也表现在要言不繁上。从语法上描写把字句和被字句，可以连篇累牍，繁琐到令读者头痛；本书在

修辞部分的主动句和被动句这一节里，却能画龙点睛地“从叙述角度一致”上来谈把字句和被字句的用场，真可以说得上是深入浅出、化繁入简了。作者举了一些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句，这里转引两例：

①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马歇尔把他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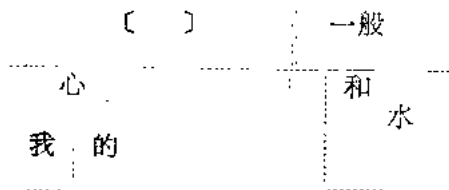
②长江是中国最大最长的一条河流，横贯在中国的腹部，把中国切断成南北两半（中国被它切断成南北两半），素来号称不可逾越的“天堑”。（杨朔《黄河之水天上来》）

如果把例①的被字句改写成把字句，或是把例②的把字句转换成被字句，就极易看出在上下文中是如何地不圆通了。

二则是结合逻辑，相得益彰。本书在讲解语言现象的时候，注意到随时与逻辑学联系，这不仅沟通了语言学与逻辑学的联系，而且能够从逻辑学的角度揭示一些语言现象的本质。如讲词类时说，实词都是表达概念的，虚词一般不表达概念；讲修饰作用时则说，修饰作用是整个词所指的范围受到限制，缩小概念的外延；副词“都”只表示判断中的量项，可见范围副词与量项有密切的联系；讲解复句的类型，处处联系判断；讲句群内部联系，时时联系推理。这种处理方法，不仅是为了适应函大教学的需要，而且说是要为现代汉语的教学另辟蹊径，好象也不算过分。

我们如果从语言学的历史发展来看，这种尝试就更值得重视。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文法学就是哲学的组成部分。按英文grammar一词，中世纪英语写作gramer，古代法语写作gramaire，现代法语写作grammaire，都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写作的技艺”。但是在很早的时候，古希腊的学者就用文法一词包括了整个语言的研究。^①原是哲学附庸的语言学蔚成独立大国乃是近代一百几十年中的事情，因而在早期的语言学中常常混杂着哲学和逻辑学的成分。例如英文中的verb to be称作系词copula；俄语的名词谓语句现代时的系词从不出现，但语法却解释为“系词+名词”的所谓合成谓语。这种混杂的情形，中国的文法书中也是屡见不鲜的。黎劭西先生解释“臣心如水”一定要补作“我的心里的乾净，和水一般，”并图解^②为：



这种用逻辑分析代替语法分析是曾经很时兴过的。

待到三十年代，结构主义盛行起来，力图把意义分析从语言学中排除掉；吕叔湘先生描写这种作法为“拚命回避意

① John Lyons: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p. 133

② 《新著国语文法》，第94—95页。

义，一头钻进死胡同^①，说得是又中肯又形象的。但是结构主义的兴起也带来一点好处，就是引起人们划清了语言结构与意义，语言学与逻辑学的界限，使人们对语法标志给以更多的注意。本书既没有把逻辑分析混同于语法分析，又能够适时地把逻辑结合进来，作者心明，读者自能眼亮。所以我说它是相得益彰。

三则是不断补充、不断修订。一年前我审阅过初稿，这次又审阅了修订稿。比较起来，修订稿比初稿篇幅增加了二分之一，从例句的增添撤换和解释的修改上说，一年之间有了很大的改进。希望今后广泛听取学员、读者的意见，不断地修订补充，做到精益求精，字斟句酌，争取成为同类教材中的“标准件”！

1983.6.28.

①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2页。

目 录

序.....	徐仲华 (1)
绪 论.....	(1)
第一章 语 音.....	(21)
第一节 概 说.....	(21)
第二节 声 母.....	(27)
第三节 韵 母.....	(36)
第四节 声 调.....	(45)
第五节 音节结构.....	(51)
第六节 轻声和儿化.....	(57)
第七节 汉语拼音方案.....	(61)
第二章 文 字.....	(70)
第一节 汉字的性质和汉字的形成.....	(70)
第二节 汉字的结构.....	(75)
第三节 汉字形体的演变.....	(83)
第四节 汉字的整理和简化.....	(92)
第五节 纠正错别字.....	(100)
第六节 汉字改革.....	(106)
第三章 词 汇.....	(110)
第一节 概 说.....	(110)
第二节 词的构成.....	(118)

第三节	词 义·····	(134)
第四节	词的单义和多义·····	(145)
第五节	词和词的意义关系·····	(156)
第六节	词汇的构成·····	(179)
第七节	成 语·····	(193)
第八节	谚语、惯用语、歇后语·····	(198)
第九节	字典、词典·····	(204)
第四章	语 法·····	(209)
第一节	概 说·····	(209)
第二节	词类(上)·····	(219)
第三节	词类(下)·····	(242)
第四节	词 组·····	(262)

绪 论

一 语 言

什么是语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言学派，回答很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对这个问题基本看法怎样呢？

（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生活在社会里，人们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别人，或者有什么问题要和别人商量，这就必须说话。说话，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就是说话者用嘴发出一连串声音，表达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听，就是听话者从对方发出的声音里了解对方的思想。说话可以沟通彼此的思想，达到相互了解。说话这一活动，也就是运用语言。语言是交际的重要工具。

说话又是人类不同于别的动物的重要特征。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记得，林黛玉有一只鹦鹉，它会说：“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还会念《葬花词》里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能不能证明别的动物也会说话呢？吕叔湘先生说：“鹦鹉能学人说话，可是是作为现成的公式来说，不会加以变化（所以我们管人云亦云的说话叫‘鹦鹉学舌’）。只有人们说话是从具体情况（包括外界情况和本人意图）出发，情况一变，话也跟着变。”^①因此可以

^① 吕叔湘《语文常谈》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说，别的动物都不会说话，没有语言，只有人类会说话，有语言，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交际工具。

人类的交际工具，除了有声的自然语言以外，还有以别的声音为物质材料的人工语言。比如戈麦拉岛上用的口哨语，就是用别的声音码化的“希尔伯”语（一种西班牙方言变体）。戈麦拉是加那利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当地居民日常会话通常用西班牙语。但是，由于戈麦拉是一个环形岛屿，中部为山峰，山路崎岖，交通不便，两个人互相能看得见，要走到一起说话，常常要花许多时间。这样，从交际需要出发，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口哨为表达形式的语言，即“希尔伯”口哨语。一名好的哨手，能同5英里外的人交谈。这种“希尔伯”语，就是运用哨音表达自然语言的一种人工语言。此外，人类还用旗语、电报代码、数学公式、化学符号等等来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也可以用图画、手势、击鼓、烽火、红绿灯等等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但是，上述这些都不能与有声的自然语言相提并论。它们有的很简单，传达信息的能力极其有限，有的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因此，只有有声的自然语言才能独自承担得起人类的交际工具，所以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

（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作为人类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直接与思维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词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只有通过语言，思维的活动成果才能最完美地表达出

^① 《列宁全集》第二〇卷第397页。

来。那么，应该怎样来认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呢？

马克思、恩格斯说：“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①。语言和思维是在人类劳动过程中同时产生的，彼此关系密切，不可分割。

思维离不开语言，这可以由科学试验得到证明。1980年，美国密苏里安大学的科学家开始阅读脑电波思维形式，并把它译成词语。科学家们把脑电图机的电极连接在被试者的头部，当被试者重复说出一个词时，就产生特定的脑波型。其后，被试者一想到这个词，就出现这个特定的脑波型。因此，根据脑波型，科学家可以辨认词，从而阅读人的思维。上述科学试验证明，人类是借助语言来进行思考的。

七十年代以后，“人工智能”的新学科大大发展，“电脑”不仅能够下棋、作曲、阅读文件、查检资料，而且能够从事一些简单的翻译工作。于是，有人认为，机器也能够思维，思维可以离开语言。不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学者认为，机器不能思维，机器不能输出任何未经输入的信息。如果说，机器有思维的话，那也离不开人类的思维。

思维离不开语言，语言也离不开思维。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物，因此，只有表达一定的思维活动成果的声音，才称得上是语言。巴甫洛夫说过：“词无论过去或现在，依然只是现实的第二信号罢了”^②。第二信号系统，只有人类才具有。词（或者词组）能够成为“现实的第二信号”，就因为它是语言的组成材料，而语言是与人类的思维直接联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25页

② 转引自捷普洛夫《心理学》235页（东北教育出版社，1958）。

的。语言离不开思维，也有神经生理学的实验根据。神经生理学证明，人脑的左半球掌管抽象的概括思维，右半球掌管感性的直观思维。一个人，如果左半球大脑受伤，就说不出话来。

语言和思维密不可分，但是它们又不是同一种现象。这表现为：

1、语言与思维的本质不同。语言是人们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

2、语言与思维的职能不同，思维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而语言则把这些规律表达出来，使它们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

3、思维是全人类的，语言是民族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思维与语言完全相同，那么，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就应该相同。事实上，各民族的语言并不相同。

总之，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与思维密不可分，但并不等同。

（三）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作为人类思维的工具，人类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1、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

首先，社会的变动，对语言的影响很明显。比如解放以后，随着劳动人民地位的提高，“厨子、看护、老妈子”等名称改为“炊事员、护士、保姆”，“车夫”则根据实际情况称为“司机、三轮车工人”等。这类情况说明，语言的产

生、发展是同社会分不开的。

其次，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大家熟知的1927年在印度发现的“狼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再如，我国南北朝时期，鲜卑族人曾统治北部地区。起初，鲜卑语是“国语”。到魏孝文帝时，“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当时以洛阳语音为标准音）”，不仅汉族人，连鲜卑族人也习用汉语之后，鲜卑语就渐渐消亡了。可见，离开了使用语言的人们，离开了社会的交际活动，语言也是不能生存的。

第三，在运用中，语言虽然表现为个人的语言活动，但是它仍然要受社会的制约，不可能成为个人武断的符号。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至今传为笑谈，而鹿还是鹿、马还是马，并不因为赵高的权势而改变。

2、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工具。人类从类人猿分化出来的那一天起，就依靠语言组织着社会的生产，发展着社会生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能够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我们无法想象，一旦没有有声语言，人类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语言的“变乱”势必引起劳动协作的破坏、社会集团的分裂，却是可以想见的。

8、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些一般的社会现象相比，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不是经济基础。语言也不是上层建筑，它同上层建筑的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每一个经济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一定的上层建筑随着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产生、变化、消亡。语言却不同。拿我国社会和汉语来说，近百年来，我国的社会制度经历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巨大

变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几经变革，但是，不管怎样，汉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第二，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一旦出现，就积极帮助自己的基础进一步形成和巩固，并且反对所有阻碍自己的基础发展和巩固的阶级或力量。语言却不同，它不是由某个经济基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在社会历史全部进程中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所创造，并一视同仁地为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的全体成员服务。

第三，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改变不是直接的，不是立刻发生的，而是在经济基础改变之后。语言却不同，它与人的生产行为和一切活动直接联系，因此，它反映生产中的改变是直接的，立刻发生的，而不等待基础的改变。同上层建筑相比，语言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复杂得多。

第四，上层建筑是同一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个时代的产物，因此它的生命是不长久的。语言却不同，它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它的生命比任何一个经济基础、任何一个上层建筑都长久得无比。

（四）语言没有阶级性。斯大林说：“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个阶级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語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

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服务，为社会各阶级服务。”^①

但是，并非人人都这么认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著名语言学家马尔错误地引用了列宁关于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的观点，认为同文化一样，语言也有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两种，语言也是有阶级性的，把语言和文化等同起来。在我国，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有人引用民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说明语言是有阶级性的。其实，这首民歌中提到的“话”，指的是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思想当然是有阶级性的，但思想并不就是语言。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工具”怎么能有阶级性呢？这是把语言同思想混为一谈了。

语言作为一个社会内部的人们用以交际的工具，它没有阶级性，它具有全民性，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说话——使用语言和所说出来的话却是个人的。这又该怎么看呢？语言学界把个人使用语言的具体活动称为“言语活动”，把个人说出来的话称为“言语”。“言语活动”“言语”有没有阶级性呢？每个人说话，在口音、遣词造句方面，总会有一定的特点。比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一开口就是“之、乎、者、也、哉”，这就是言语的个人因素，这些东西，用得适度，可以反映使用语言的某些个人风格；但是，用多了就会影响交际。因此，言语的个人因素要受到社会交际的制约，不可能占优势。至于个人独特的口音、违反全民语言规律的遣词造句等，这些则是非语言的因素，更不能得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603页。

到社会的承认。可以这样说，个人的言语活动，必须使用全民的语言，个人说出来的话，即言语，也必然是在全民语言的基础上形成，所以，无论是语言，还是言语活动、言语，都是没有阶级性的。

语言没有阶级性，但是社会各阶级对语言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当我们说人类社会不存在一种只供一个阶级使用、只为一个阶级服务的“阶级语言”时，并不排除如下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即各个阶级（或阶层）都尽量把阶级（阶层）本身的思想、爱好、偏见、情趣、习惯……塞进全民共同的语言中去。这样，就有一些黑话、雅言和特殊的行业语被某些集团的人们创造出来。比如，我国旧社会的走私贩把数字变成密语：“一”叫做“旦底”，“二”叫做“挖工”等等。江湖匪盗也有“黑话”，他们把“眼睛”称为“招路儿”，“衣服”称为“叶子”。至于特殊的同行语，如茅盾在《子夜》中描写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中流行的“多头（买进）”“空头（卖出）”“老大（黄金）”“老二（美钞）”等等都是。在西方，则有一种“客厅语言”，是阶级习惯语。比如把“日历”叫做“未来的记忆”，“森林”叫做“乡村的装饰”。

但是，上述情况的存在并不能改变语言的全民性。因为：第一，这种词语，数量很少，使用范围有限；第二，这种词语，不能独立，必须在全民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斯大林在批评马尔时明确说过，语言没有阶级性。

（五）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和一般符号相比较，人类的语言也是一种符号。符号都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语言符号的形式就是声音，语言符号的内容就是意义。语言就是